目　录

"马日事变"亲历记……魏　镇（1）
关于"马日事变"的片断回忆……文斌等（21）
"马日事变"后湖南各县的大屠杀（一）……李仲任等（58）
"马日事变"后国民党湖南省党校
　的反共活动……吴剑真　许茹春（74）
我参加了何键的清乡大屠杀……欧　冠（85）
浏阳县清乡屠杀的片断回忆……彭源瀚（100）
何键豢养的一条毒蛇——陈光中……周楨　唐希抃　戴岳（111）
何键手下的一名刽子手——曹明阵……田士清（130）
何键的出身和起家……刘岳厚（138）
何键利用蒋、桂矛盾取得湖南政权……张慕先（148）
何键联桂驱鲁和附蒋讨桂经过……彭松龄（167）
何键联桂驱鲁的一幕……戴　岳（174）
何键与桂系互相勾结的片断回忆……唐希抃（180）
两广"六一"事变中何键玩弄两面手法……罗子雯（185）
何键与谭延闿……黎泽泰（192）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马日事变”亲历记

魏　镇

一九二七年湖南的“马日事变”，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反革命派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反革命派公开合流的信号。这个事变的直接幕后组织者何键是当时躲在革命阵营里的野心家之一，是湖南地主阶级当权派的代表人。为了组织这个反革命叛变，他纠合了一批北伐军中的反动将领、国民党的右派分子和湖南一些身据要津的反动官僚政客、大地主，作过长时期的处心积虑的准备，在两湖进行过一系列的阴谋活动。那时，何键任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唐生智）第三十五军军长，我任该军学生队队长，随军部驻在汉阳，一九二七年四月下旬，我随何键派到湖南负责策划“马日事变”的代理人余湘三回到长沙，并参与过他所主谋的幕后活动，对事变内幕有亲身经历和亲见亲闻。现就回忆所及，记其梗概，以备史乘参考。

何键在武汉的反革命阴谋策划

何键虽于一九二六年随唐生智部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参加了北伐战争，但对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是根本不赞成的。据说，在那年冬天他率部驻在宜昌，与其左右亲信谈到湖南的工农群众革命运动高涨形势时，就认为“国民革命在军事上是节节胜利，在政治上却处处失败。”及一九二七年二月，他奉命率部由鄂西移防湘西驻在常德时，对湖南的农民运动和整个革命胜利形势的恐

惧和仇恨更为加深了。据他自己在一九二八年（时任湖南全省清乡会办）“马日事变”周年的丑表功讲演中说：在一九二七年二月间他曾同三十五军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王基永作过一次谈话。谈话时，他伪装着一副革命面孔，谈了一番欲使革命进行到底应使军队与工农结合的道理；王基永也同他谈了一些关于农民运动和改造旧军队的意见。何键自己说，当他听了王的谈话后，“不禁毛骨悚然。”他这番话正是他对当时农民运动和整个革命深怀恐惧和仇恨的自供。因此，那年三月间，他率部移驻汉阳后，便进一步窥伺时机进行背叛革命的阴谋活动。

何键左右的一批高级幕僚，如军参谋长王芃生、秘书长凌璋、经理处长汤焕彬、顾问吴凯南（汤吴均系何的拜把兄弟）、参谋处长史民、秘书易书竹等人都是他所倚畀以成其“曾左彭胡事业”的班底，也都是醴陵的大地主分子。三十五军又是以醴陵的“子弟兵”为基干组成的。这时，在何键的军部里和其他一些集会场所，经常有一些人，三三两两，议论有关两湖的农民运动，传播着种种诬蔑和丑化农民运动的谣言，如说官兵寄回家的薪饷被农会没收分配了，某人的父亲被农会抓着戴高帽子游垅了，乃至湖南要实行共产、共妻了等等。这些谣言都不胫而走。地主亲族从湖南逃到武汉时，带来的种种反动宣传，也都成为大家议论的中心。有一次贺耀组的大女儿从长沙逃到汉口，我们学生队队附谢武汉受贺函托，招待她住在汉口扬子江饭店，我曾同谢去看过她一次。这位平日连梳头都雇有专人侍候的大小姐，到了汉口两天，因无人侍候，自己竟不知梳洗，样子狼狈不堪。她这副形象也成了官佐们议论和思索的题材。在当时种种闲谈和议论中，有些人毫不掩饰地流露出对农民运动的仇恨，说：“这太无法无天了！”有的拍桌大骂共产党“革命革到老子头上来了！”有的提出要求将农

民运动“糟得很”的情况报告唐总司令和政府“纠正”。当四月上半月，长沙的几个大劣绅李右文、叶德辉、俞诰庆等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后，从湖南传到武汉部队中的谣言就更多了，我们在军部官佐间听到的议论也更多而且更为恶毒，有人公开恐吓说：“继续这样搞下去，上面也不理，我们底下就只有造反了！”何键对这些官佐中日益嚣张的反动议论是完全心中有数的；他不但不加以阻止，而且还巧妙地利用这种反动情绪，布置其心腹，在官佐间有意识地透露其反共衷曲，推波助澜，为其阴谋活动作舆论准备。如史民在某次饭后闲谈时，就公开说：“叶翠公（指三十五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叶琪）和军长谈到共产党时，总是拍桌大骂共产党和农民协会，主张消灭它们。”

由于武汉是当时革命中心所在地，北伐战争仍在进行，武汉国民党上层人物的真实态度还不明朗，何键的反共阴谋活动，最初只敢在他左右的高级幕僚和同他个人关系较深的少数军、师长间暗中进行；对中下层官佐，他还是装着一副革命面孔，喊着革命的口号，不敢随便公开透露他心里的阴谋诡计。

何键的反共面貌的公开暴露，首先表现在土地问题上。这年春天，武汉国民党中央设立了一个中央土地委员会，何键也名列委员之一。四月间，土地委员会开会讨论土地问题纲领时，他在会上公开诬蔑农民运动，列举了两湖农民运动的所谓种种“罪状”，坚决反对没收地主的土地。会议在何键这帮人的压力下，制订了一个保障革命军人土地“不受侵犯”的条例，但仍承认了没收大地主土地的原则。这个土地纲领当然不能满足何键的要求。他在会上的叫嚣，原意也只是想借此打开一道公开反共的缺口。他从这次公开的反革命叫嚣中摸到了武汉国民党右派首要的底，从此，他进行反共阴谋活动的胆子渐渐大起来了。特别是以蒋介石为首

的南京反革命派先后在上海、南京、广州掀起的反革命叛变，对何键及其反革命集团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他背叛革命的意图因而更加坚决和急切了，其反共阴谋活动也从上层闻的秘密勾结发展到在中层干部中进行具体策划。

四月下旬某日，何键在军部参谋处同官佐们谈话，我和余湘三也在座。他听了大家对时局的不满意见后，说："你们这些议论、咒骂、哀叹有什么用呢？总指挥去河南前，我曾将湖南农民运动无法无天的情况向他详细报告过，问他怎么办，他叫我有事和汪先生（指汪精卫）商量。现在共产党这样猖狂，汪先生也没有什么办法。我们讲了许多话，结果只讨到一个革命军人土地保障条例，这也不过是一纸具文，没有什么用。他们还不是照样搞！这叫我有什么办法？"言下愤恨异常。过了一两天，我同余湘三又到参谋处参加官佐们的"闲谈"，史民对大家说："现在只有学蒋介石在京沪一带的作法，设法迅速制止共产党的活动，才能救得了我们自己的身家性命！"我们一听，就知道这是何键要史民来试探官佐们的态度的话，当下一致赞同他的意见。经过这样多次酝酿之后，军部官佐们都表示愿意服从军长的指挥，伺机行动。

最初，何键曾企图用捣乱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群众集会的办法，从破坏城市群众运动开始实施其反共叛变阴谋。四月下旬，他曾在汉阳组织了一批打手（主要是便衣士兵）破坏某一工人集会。但当打手刚一行动，很快就被工人纠察队所驱散，大会仍照常进行。经这次失败之后，何键及其参谋人员都感到单靠这类偷鸡盗狗的办法，顶多只能泄愤一时，终不能成大事。因此，他们决定放弃这种办法，而采取发动军事叛变的办法。为此，何键于四月底利用唐生智总司令去河南前线的时机，在汉口邀集了一次高级将领会议，密商发动清党反共的军事叛变的计划。参加这次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秘密商谈的主要人物，除何键自己及其副军长叶琪之外，还有第八军军长李品仙（兼武汉卫戍司令）、独立第十三师师长夏斗寅、三十六军副军长兼代湖南省政府主席周斓和该军秘书长兼驻汉办事处主任马继中等人（这是当时的第三十六军军长、现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刘兴告诉我的，那时他已率三十六军赴河南前线作战，李品仙曾将这次会商的大致内容用电话告知住在汉口的三十六军秘书长马继中，会后马继中将会议要点报告了刘兴）。在会商中，夏斗寅是主张反共最激烈的，对何键发动军事叛变的阴谋表示坚决支持；李品仙则主张边报告、边行动，但大家都不赞成；最后决定秘密进行，斩而不奏。关于发动叛乱的地点，最初他们曾考虑首先在武汉发动；当时有人对何键说："你们自己有部队驻在汉阳，何不就在武汉三镇动手？"但何键不赞成，他的参谋人员也都反对，李品仙更不敢负首难之责。原因之一是此刻大家对于唐总司令对反共清党的态度都不完全了解，怕闯下大乱子没有人替他们承担责任；尤其重要的是第四军的叶挺师就驻在武昌，武汉三镇工人纠察队的势力也未可轻视，军事叛变成败未可逆料。因此，他们经过反复研究之后，为了便于推卸责任，同时又便于在幕后组织和领导这个阴谋活动，决定避开武汉，改在湖南首先发动，随之由夏斗寅在鄂东南响应，然后由何键自己的部队和李品仙的第八军相机在武汉举事，以成其"两湖并举"的清党反共"大业"。何键在这个阴谋中所依靠的军事力量，除他自己当时驻在汉阳的部队外，还有驻宜昌的夏斗寅独立第十三师、驻岳阳、长沙间的第八军第一师张国威部（张当时兼武长路护路司令）、第二师吴尚部和第三师李云杰部（均驻汉口）、湖南省防军独立旅唐生震部（驻常德）、第三十五军第一师叶琪部（驻岳阳）。

何键在湖南发动军事叛变的最初布置

何键将他的反共军事叛变首先发动地点选在湖南，固有其种种优越条件，但也有一些困难，主要是长沙没有他的直属部队；叶琪师驻在岳阳，又没有理由要求将前方部队后调。经与参谋处商量，决定以武汉没有适当驻地为由，呈准将三十五军学生队移往长沙训练，并乘机以汉阳学生队为基础，将学生队改为教导团，以之作为在湖南发动军事叛变的基本力量。这个计划是在四月下旬决定的。同时决定由王东原任教导团团长，陶柳、晏国涛和魏镇分任大队长。在这个计划确定之后，王东原来到长沙，在小吴门处四十九标设立团部，着手教导团的筹组工作。计划是：第一大队招收初中毕业生数百人组成两个步兵中队和机枪、炮兵各一个中队，限于暑假期间招足，在五十标成立，由魏镇任大队长；第二大队为步兵四个中队，尽速招收新兵，于学院街三十五军后方留守处成立，由陶柳任大队长；第三大队由晏国涛任大队长，暂缓成立。

何键确定了在长沙成立教导团的计划后，随即先后召见了王东原、陶柳、晏国涛、魏镇等人，具体交代去长沙的任务；并以余湘三为他在湖南具体策划军事叛变阴谋的代理人，令我和余湘三带领汉阳学生队新毕业的四十多名学生赴长交王东原以下级骨干任用。

我和余湘三是五月初回到长沙的。约在我们动身赴长前两天，何键派小汽车接我们去军部谈话。何键对我们谆谆训示说："你们到长沙以后，最要紧的是掌握住部队。要把自己部队的刺刀开口，免得军情紧急时措手不及。要特别注意留守处的安全，有什么风吹草动，你们要和留守处共存亡。这是你们的责任！"这

是何键第一次以如此严重的态度向我交代任务。当时我思想上感到有些紧张。余湘三看到了我的表情，知道我对任务还不摸底，后来在我们同回长沙的车上，他郑重其事地将何键的意图对我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现在湖南的农民协会和工人纠察队凶得很，我军学院衡后方留守处储存有不少的枪枝子弹，还有些大炮和炮弹，恐怕暴徒抢劫，军长很不放心，又不便抽调前方的部队去保护，因此，特命教导团在长沙成立，借以保护留守处的安全。这样做顺情合理，不露半点形迹。我们到长沙后要好好干！"虽然何键和余湘三始终不曾对我明言其所谓"顺情合理、不露半点形迹"的究竟，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时我对他们的罪恶阴谋，也已心中有数了。

类于余湘三

何键为什么选上了余湘三作他在湖南策划军事叛变的代理人呢？这里且对余湘三的情况作一简短介绍。

余湘三，字甲文，醴陵县洋川冲人，保定军校三期炮科毕业，曾在零陵镇守使刘建藩部任排长。刘死难后，曾与同学何键、张国威等在醴陵组织游击队。一九二〇年投入李抱冰部任炮兵连长，在津市、澧县一带与王育寅部作战，右脚负重伤致跛。后来，赵恒惕政府为了照顾他，委他任安(乡)澧(澧县)厘金局局长，他乘机弄了一些钱，在醴陵家乡买了一百多石田。一九二六年十月，他到汉口找何键，何委他为军部中校参谋，派到汉阳学生队军事教官。我和他是这时认识的。他因与何键有同乡同学和同事等几重关系，颇得其信任。我虽为学生队队长，但有关队里的经理、人事问题的决定，都须通过他才能得到何键的批准；同时他在学生队也负有部分责任，所以我在工作中都是事事依靠他的支持，他

对我是有左右作用的。他尝自称不愿作官，不愿显露名声，只想作些闲散差事，“说说话，参谋参谋”。他平日最好打牌，喜欢玩弄阴谋诡计。同他臭味相投的人也常奉承他是一个“兵家而兼有策士才”的人物。他确算得上一个善于奔走策划的阴谋家。当他到三十五军不久，他的这分“才华”，很快就得到何键的赏识。他平日与何键接触密切，敢于“直言”。何键这个以“曾左事业”后继者自命的野心家，也装成能纳“忠言直谏”的样子来笼络他。因此，他对何键也忠心耿耿，以报其“知遇”之恩。同当时何键豢养的汤焕彬、吴凯南等反动策士一样，余湘三也是满脑子的极端反动的封建地主思想，对共产党怀有刻骨的仇恨，对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也是根本反对的。某日，三十五军学生队头一次举行“总理纪念周”，第二师师长刘建绪代表何键到队主持。当全体员生随刘恭读总理遗嘱时，声浪参差不齐，此起彼落，大出洋相。余湘三对于读总理遗嘱，极为反感，会后对我说：“背孙大炮那一套，真叫活见鬼。”学生队的政治教官宁翔（国民党员）某次给学生队讲农民运动课，将几句他自己也不懂的条文翻来复去背诵，下堂后，余湘三问他：“你左一个‘武装农民’，右一个‘农民武装’，究竟怎么一个武装法？”宁翔被他问得无辞以对，只好说：“上面规定这么讲，我有什么办法？”余湘三平日貌似深沉，不轻易向人表露他灵魂深处丑恶肮脏的思想。与他接近的人则知道他是何键左右坚决主张反共的一人，是何键的清党反共阴谋的直接参与者之一。“马日事变”后，他曾任湖南省会公安局局长；何键任湖南全省清乡会办时，他受委实际负责湖南省团防训练所的工作；何键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兼四路军总指挥时，他建议设立四路军干部学校以培植嫡系势力，被何委为四路军总部少将高参和省政府顾问。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余湘三等到长沙后的活动

我同余湘三于五月初回到长沙后，耳闻目见，感到湖南工农革命运动的声势比武汉更为壮大，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异常尖锐，因而内心交织着恐惧与不满之情，对何键所交代的反共任务不免有些动摇；而余湘三的反共谋叛的意志却更加坚决和迫不及待了。有一次，当他同王东原、晏国涛和我商量教导团招兵问题时，他表示不惜以身家性命，同共产党拼到底。

关于发动军事叛变的兵力问题，是叛变策划者首先必须考虑的。何键最初企图拉张国威的部队充当叛变的主力。约在五月十二日，何键特派三十五军陶广师部经理科长黄慧僧，携带致张国威的密信和一笔巨款，专程来长见张国威，商谈此事，并要余湘三予以协助，极力促成。何在致张的信中，对发动军事叛变的作法，主张先用便衣枪兵偷袭革命机关，随即出动正式部队，借维持秩序之名，掩护便衣枪兵，包围、捣毁这些机关，并乘机扩大事态，举行公开的清党反共的叛乱。当时任湖南省政府军事厅长兼代主席的张翼鹏（醴陵渌口人，曾任保定军校战术总教官，后任唐生智北伐军前敌总指挥部总参谋长、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同何键、余湘三有同乡和师生之谊，交情甚厚。余湘三受了何键的重托，将何的清党反共阴谋详告张翼鹏，并挽其恳商于张国威。张国威以其部队主力已开往岳阳为词，不愿承命。实则因他与何键私嫌向深，不愿为何所用；同时也因为对唐总司令的态度不摸底，怕负不起责任（不久他留长的余部也开往岳阳去了）。这时驻在长沙的部队还有第四集团军的一个警卫团，团长周荣光兼长沙卫戍司令，所部四个营，分驻四十九标与五十标，兵力最为雄厚。另有李品仙的第八军教导团，驻浏阳门外，团长

李殿臣（晋阶），所部全系新兵，不能单独有所作为。王东原的三十五军教导团招收新兵的计划，这时还没有实现；陶柳还在汉阳（在三十五军第三师陶广处当营长）。余湘三在拉张国威的计划失败之后，又就商于张翼鹏，请他以代主席名义调周荣光团听用。张翼鹏对何键的叛变阴谋虽衷心赞同，对余湘三的奔走策划极力支持，但同样也摸不清唐总司令的真实态度，周荣光又是归唐直接指挥的部队，怕他泄露秘密，影响自己，因此也不敢下命令要周荣光来干这个罪恶勾当。

余湘三见拉拢上述驻长部队发动军事叛变的计划一时不能实现，便转同王东原、晏国涛和我商量，主张以三十五军后方留守处的名义立即招募新兵、尽速将教导团成立，并由我担任后方留守处主任，负责招兵。我对这个任务感到很为难，问余湘三：没有上面的命令，能否自行招兵，这个擅自招兵买马的责任谁来替我们背？他却很有把握地说："我可替芸樵（何键号）负责；张矮公（指张翼鹏）是我们的知交，怕什么？"为了招兵的事，余湘三天天追到我家里，要我迅速着手搞。在当时的革命高潮下，象过去那样把旗子一竖就可招徕几百几千已不可能，这时在乡下招兵要通过民农协会才行得通，在长沙城里实际已无兵可招了。

过了一两天，恰巧陶柳从汉阳带着两百名老兵来到长沙。这给我们解决了自行招兵的大难题。陶柳到长沙后，就由他担任三十五军后方留守处主任，并以他带来的两百多名老兵为基础，成立了三个连，作为三十五军教导团的基本队伍。原来的自行招兵之议，从需要上说，也没有以前那样紧迫了；而且余湘三对学生带兵的作法本就怀疑，因此，招兵的事便无形中搁置了下来。

陶柳也坚决反对另行招兵起事。当我们共商起事的具体步骤时，陶柳说："现在时机紧迫，如果要靠招好了兵再来发动，不知

道要等到哪一天?"大家认为要想起事得到成功，仍须利用正规部队；如果单靠三十五军教导团这几个连的兵力，一动就会被消灭。陶柳忽然想起他的故交、当时驻湘乡、湘潭整训的许克祥独立三十三团来了；他介绍了许克祥及其部队的情况，极力推荐此人大有可用之处。经共同计议，遂决定由余湘三商请张翼鹏以增防长沙为名，将许克祥的三十三团调来长沙，作为发动军事叛变的主力部队。张翼鹏同意这样做了。

关于许克祥

许克祥，号长胜，湘乡县人。行伍出身。清末入营当兵。一九一二年投入宝郡守备区卿衡部任连长。后投入朱泽黄旅任营长。赵恒惕主湘时，又投入陈嘉祐旅任营长。嗣后赵恒惕解决陈嘉祐旅，许即同陈旅另一营长陶峙岳拖队伍投往湘西镇守使蔡巨猷部，被委为刘叙彝的第九旅毛炳文团的营长。时蔡巨猷横行湘西，其部队专为川滇黔等省贩卖鸦片的客商护运烟土，抽收过境税，以充军饷，获利极巨。许克祥妻系妓女出身，善于逢迎，与过境烟商交往甚密，从中分润不少。后许即以此在湘乡购置田产百余亩。一九二六年，贵州军阀袁祖铭进据湘西，许又投奔袁祖铭，被委为旅长。是年冬，许随袁进驻常德。时唐生智部教导师代师长周斓奉唐令解决袁部，周派人策动许克祥，协同扑杀袁祖铭。事后，周斓将许部收编，委许为独立第三十三团团长，令其率部驻湘乡、湘潭整训。这个惯于在军阀厮杀中东奔西投的亡命之徒，正具有为何键这类野心家所需要的那种冒险性。当张翼鹏将他的部队调到长沙来时，使他受宠若惊。他之毅然承担军事叛变首难之责，也使张翼鹏、余湘三等如获至宝。事变之后，各县逃匿长沙城里的豪绅、地主和蝟集在长沙的反动官僚、政客等各色

反革命分子都奉许克祥为"救世主"，歌颂他"有胆有识"，有些大地主家里还供奉着他的长生牌位；湘乡的一批大地主豪绅特地为这个刽子手在县城云门寺前立了一块很大的"纪念碑"，何键及其手下的一些人都曾为之题词。

事变前夕的策划和布置

许克祥的部队约于五月十四、五日奉张翼鹏令调来长沙，驻小吴门外炮队坪及识字岭一带(团部驻炮队坪)。他刚到长沙时，对军事叛变首难之责尚有所顾虑，不肯独担重任。经张翼鹏、余湘三、陶柳等强调清党"反共"的必要，陶柳并告诉他这是大富大贵的绝好机会，再加以各方面的推戴奉承，他就毅然担任了这个反革命叛乱急先锋的角色。这时，张翼鹏、余湘三等便也同何键一样隐身到幕后去了。张大玩其两面手法，一面继续装着一副革命面孔，一面暗中积极支持余湘三的阴谋活动，所有对外活动则完全由许克祥出面。

从许克祥到长沙之后，反革命集团发动叛变的准备工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许克祥不但到处喊，公开煽动各界仇恨农民协会和工人纠察队，而且组织他的官兵深入友军进行串联活动，利用军官家属对住在省城的同乡戚友进行广泛的反共宣传、制造、散布各种丑化和诬蔑工农群众革命运动和动摇人心的谣言，使尽一切办法以激起下级官兵对共产党和革命运动的仇恨，制造混乱，煽惑人心。许曾对自己部队的官兵公开造谣，说他部某排长在湘潭街上买东西，被纠察队抓去捆绑游街示众，最后被用乱棒打死，余湘三也到处造谣说醴陵县某部营长被农民协会枪毙，桃源县某部连长被农民协会用梭镖戳死。

关于发动军事叛变的方法，余湘三最初仍想照何键在给张国

威信中提出的办法行事，他认为这样既能实现罪恶目的，又可替何键减轻责任。许克祥与陶柳则坚决反对这个办法，他们认为这样做，既不能彻底摧毁共产党和各个革命机关的活动，而且事先要将所有驻长部队官兵一一联系好采取共同行动，事实上也办不到；如果发动叛变不成功，不但反共目的达不到，而且自己可能遭到毁灭性的反击。经过一次有余湘三、王东原、许克祥、陶柳、李殿臣、晏国涛和魏镇等参加的会议（约在五月十七日）再度商议，决定用公开的军事行动发动叛变。这次会议是在许克祥的团部里开的。会议决定由许克祥担任叛变行动的指挥官，由他的三十三团担任叛变的主力部队，陶柳的三十五军后方留守处部队及其他驻长部队配合行动。关于发动叛变的日期，大致决定为五月二十一日（因为这一天是星期天，有利于突然发动），但仍视准备工作进展情况再作最后决定。会上，余湘三对许克祥的欣然承担首难之责大加推崇奖饰，并当众说："现在我们已公推许团长为领袖，大家要多去看看他。"王东原也是一个积极反共但又不敢出头首难的阴谋家，现在许、陶两人既愿出头发动，他自然乐得顺水推舟。

这时，尚待完成的叛乱准备工作，主要是对其他驻长部队和军事机关的争取联系问题。在许克祥团调来长沙之前，除周荣光团以外，其他部队大致都已由余湘三奔走联络好了。最初感到最难争取的是驻小吴门外校场坪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校长为石醉六），后来通过其总队长谢煜涛和大队长文九德的关系，也很快取得了联系。在五月十七日的会议上，大家着重分析了周荣光的情况，鉴于他的态度此刻仍捉摸不定，决定直接拉他所属的几个营长，争取他们在许、陶部队行动时采取旁观态度。

这时，夏斗寅已在宜昌发动反共叛变，其叛部迅速迫近岳阳、

临湘，指向武昌，武长铁路交通被阻，外间盛传已久的何键的反共阴谋也因夏斗寅的叛变而更加证实（这时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已公布了夏斗寅的清党反共通电）。夏斗寅的提前发动，打乱了何键原来的“两湖同时举事”的计划，使其不再有待机行动和从容准备的余地了，共产党湖南领导方面这时似已开始觉察到局势的严重性，曾要求张翼鹏将驻长部队调往岳阳增防，以阻击夏斗寅叛部南犯。张对此则借词推脱并设法阻挠。

军事叛变已迫在眉睫，局势更加紧张了。就在十九日晚间，当工人纠察队巡经学院街三十五军留守处时，留守处驻军即乘机诬称纠察队企图夺取留守处枪枝，公然鸣枪挑衅，将十几个纠察队员的枪缴了。经党、群领导方面严重交涉，到第二天才予发还。

这时，我眼见在工农群众的革命威力面前，乡下地主的威风已经扫地，城里象李右文、叶德辉等一向穷凶极恶为非作歹的豪绅已被整倒了；现在我们这一小撮人要正面与革命相对抗，成败未可逆料，万一事变失败，闯下大祸，谁来替我们担当？当想到这种种时，心情不免有几分沉重。但我早已搭上了何键驾的这条贼船，上述偶尔出现的沉重之感，也就转瞬即逝。不过，这时我对余湘三的策划，也有同王东原一样的想法，就是让许克祥、陶柳他们出头去搞，自己不在紧要关头公开露面。

“马日事变”的发动

二十一日下午五时左右，我从四十九标回到南门外家里，想把时局紧张的情况告诉家人，叫他们在听到外面枪响时不要惊慌，并要我爱人立即通知我的族妹魏斌（时为共产党员，后叛党）迅速逃避。当我到家不久，余湘三突然来到我家，行色匆匆。我

与他已两天不见面了。原来他于十八日晚去岳阳，先天才回。他将这次去岳阳的任务和结果大致告诉了我：由于夏斗寅叛部已迫近岳阳、临湘，必须将我们在长沙发动叛变的计划通知驻岳阳的叶琪部，并要他们同夏斗寅部紧密配合，以支援我们在长沙的发动；经与叶琪的副师长周磐和他的几个团长共同商定，他们表示坚决支持长沙的发动，由叶琪将部队集中岳阳、通城一线，名为防范夏斗寅叛军南犯长沙，实则与夏部配合，以阻止武昌方面叶挺师的南下，另由叶琪通知常德的熊震部，令其与长沙叛变采取一致行动。说完这些后，余湘三又郑重其事地对我说："现在决定按原计划在今晚发动。你怎么还呆在家里？赶快回营，和警卫团的几个营长联系一下，邀他们到许团长那里看看情况。"当我急急忙忙赶回四十九标时，周荣光的几个营长安民等已在门口等着。我当即带着他们去见许克祥。

这时，四十九标到炮队坪一带，沿途岗哨林立，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我们一到许克祥处，坐未定，许即大声对我们说："我已决定今晚十一点钟动手。"许克祥当晚发动叛变的行动布置是：南正街、南门口一带地区的戒严和对东茅巷、东长街的总工会、公安局、特别法庭等机关的进攻由陶柳的部队负责；其余地区的戒严和进攻革命机关的任务全由许克祥的部队负责。

晚十一时正，市内枪声突起。浏阳门外、东茅巷和南门口一带枪声最为激烈，小吴门、东车站和东长街一带枪声较为稀疏。

枪声初起时，我同王东原都在四十九标教导团团部静坐以待，只见一般不知内情的连以下的官兵显得很紧张，周荣光特别慌张。张翼鹏这时装做不知内幕的样子，打电话给周荣光查问事件真相。周无词以对，转问于王东原。王推说不知道，叫他问我，我也推说不知道，要他去问自己的营长。周说："他们也不知道。"

我说："他们真不知道吗？为什么他们没有动静呢？"周语塞。

许、陶叛部当晚向省党部、省、市总工会、农民自卫军总部、省党校、特别法庭等革命机关和工人纠察队发动了猖狂的进攻，恣意搜查、捣毁，并"查封"了这些革命机关，夺去了纠察队的枪枝，放走了拘押在特别法庭的全部土豪劣绅人犯。共产党领导方面和革命群众对这个突然发动的叛变虽处于被动，但许、陶叛部的进攻仍遭到了革命力量的坚强抗击。直到二十二日晨，市内枪声才停止下来。当晚全市有不少的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人士和工农革命群众、青年学生惨遭杀害。

二十二日全市沉浸在反革命的血腥恐怖中。这天，王东原和周荣光都不见了，原来是被余湘三找去同许克祥等策划叛变实现后的第二步措施去了。二十三日，这一伙军事叛变的首要分子在长沙市戒严司令部（周荣光兼司令）集议，成立所谓"中国国民党湖南省救党临时办公处"，作为反革命叛变的公开领导机构，由许克祥、周荣光、李殿臣、王东原、张敬兮等五人自封为这个反革命领导机关的"临时主席团主席"，公开发布由它统一"拿捕暴徒分子"事权的命令；还以"长沙救党运动大会"的名义发出臭名远扬的五团长清党反共通电。通电全文如下：

"各报馆均鉴：以党治国，载在党纲，凡百设施，胥遵党命，政府受其指挥，人民赖其利益，甚盛事也。吾湘政府，自去夏改组以来，发号施令，咸遵省党部之指挥，事实具在，共见共闻。所惜真正国民党员，大都奔走四方，在外工作，致使本省最高党部，成为鬻党求荣借党营私者所盘据。彼辈以国民党为招牌，以销售舶来物为目的，广布党羽，擅作威福。打倒封建制度，非无界限也，彼辈则借以诛锄异己。发展农工运动，非无途辙也，彼辈则借以招纳亡命。如饮狂药，毒遍全省。国民革命，本各界共同之责任，彼辈强事轩轾，鼓惑农工，始则驱农工与其他各界斗争，继则驱农工交互斗争，终则驱农与农斗争，工与工斗争，折断联合战线，发挥部落思想。未及数月，遂令市井萧条、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